

邓力群同志关于学习《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发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这个重要文献。我由于参加了《决议》的下分起草工作，接触过中央领导同志对起草《决议》的有关指示和讨论情况，对它的起草过程比同志们熟悉一点。对《决议》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对一些理论问题、原则问题的斟酌，一些提法上的考虑，直至一些字句的斟酌，都知道一些情况。把这些情况向大家作个介绍，对有关问题作些解释，可能对同志们学习和执行《决议》会有些帮助。

六中全会上，我在西南组曾经有个介绍发言，那次大家听了比较感兴趣的是小平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陈云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耀邦同志的一些重要意见。现在该传达的都已经传达了，考虑到《决议》的内容都是正直论断的口气，我这次准备换一种办法讲，传达了的内容就不再讲了，打算按照《决议》的八个下分，讲讲每个下分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着眼点在哪里？打算介绍一下《决议》有关问题的针对性，它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背景，把它的“底”露一下。下面我就开始介绍。

首先讲点《决议》发表后的状况。这次六中全会到会的同志普遍对《决议》表示满意，认为原来的基础还不错，经过修改后已经很好了。小平同志也表示，这个《决议》是好的，这个稿子是好的。他在六中全会过程中和以前，曾几次看过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决议，

在比较之后认为，现在的《决议》比四五年那个决议写得要好得多。《决议》公开发表后，党内的各级干部直到普通党员，党外的民主人士，普通的工人农民，我所看到的反映都是很高兴、很满意的。有一份材料，反映《决议》发表后，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些居民小院落里引起的强烈反响的情况。人们说：“现在毛主席的功过分浅了，理直气也顺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位居民委员会干部亲自对记者说：“过去毛主席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尊敬他，可就是觉得离他很远。如今党中央通过了《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好象把他老人家从天上传回到了人间，和我们老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亲了”。这段反映不长，确实代表了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看法，语言很亲切，道理也很深刻。国外的朋友、阶级兄弟、共产主义运动的同志，包括资产阶级的政党、知名人士、公正人士、报刊的评论，除了苏联、除了台湾还是老腔调以外，其它的国家尽管说法不尽相同，但总的对《决议》的评价还是很好的。我们的同志和一些友好人士说：中国共产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很有勇气，不遮不掩，毫不含糊，可以说，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或者说是严肃的，可是对他功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合乎事实的。在六中全会期间，我们也向党外人士征求了意见，普遍反映：《决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是严肃地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这一点确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党敢于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严肃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听到这些反映，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在讨论《决议》过程中，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和一些理论工作者，意见很多，在有些问题上分歧很大。在修改中，说老实话，他们有些意见没有被采纳。这样，《决议》发表后，他们会有些什么反映？

我接触这样的同志不多，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同志来看，他们对《决议》也是很满意的。

下面具体说一下这个《决议》为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第一条，党中央，主要是常委、书记处领导，由小平、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去年三月，起草小组提出了一个比较粗的设想，小平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不满意，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或叫三项基本原则。从那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他反反复复强调要按这三项原则办事。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反复阐述、发挥，自始至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各种反对的忌见出来以后，都进行批评帮助，目的是为了坚持这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要体现在整个《决议》的结构、重大问题的判断、每个重要的提法中，甚至体现在字句中去。坚持这一条，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小平、耀邦同志明确地规定了指导思想，而且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决议》就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受到这样的拥护，能够取得这样思想的一致，认识的一致，并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反对的忌见，可以设想，其结果一定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是产生思想混乱；不是加强团结，而可能形成分裂。关于三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在六中全会上西南小组有个发言，作了介绍，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是要强调说一下，小平同志在讲完三项原则之后，又说：总体来说，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則，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而其中最根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在讨论中间，有各种忌见，我们也未能很好表达三项原则，小平同志每看一次，

就提一次批评，说没有体现出三项原则。直到后来，他认为三项原则的要求基本达到了，他讲基本论点不再改了，基本结构也不再改了。凡是有利于体现三项原则的总见，不管大小，通通接受；凡是不利于三项原则的，或有碍于三项原则的，一概不接受。小平同志办事是很干脆的，很果断的，只要是不利于三项原则的总见，不论有多少理由，就不接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先讲，那些总见接受了，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三项原则，还有十条总见，一概不接受，一条也不接受。他多次讲过，《决议》里最关键、最根本、最基础的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如果这一条写不好，宁愿不做这个《决议》。因为这一条是关系到党的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我们党成立的那天起，到他逝世为止，整整五十五年时间，同我们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写不好，就宁愿不作这样的决议。在每次谈话过程中间，耀邦同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支持、拥护小平同志的总见。他对于那些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原则的总见，也旗帜鲜明地多次表示不能够接受。这是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条，《决议》是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通过民主讨论完成的。在《决议》的讨论过程中，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集思广益，博采众议，集体修改，共同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创作。最后通过的《决议》，从起草小组内下来说，就分不清楚这一段是谁写的，那个总见是谁改的，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决议》，正式提交集体讨论的，就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提了很多总见，进行了很大的修改，然后就提交全国四千人讨论，这就是去年年底的那次大讨论，高级干下都参加了。在那次讨论中，大家提了很多好的总见，也提了一些相当尖锐的总见，

比如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我们人民造成的损失，是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这个话相当地出格了。小平同志看了这段意见以后说，如果这样来写决议，这样来看问题，那我们连波尔布特都不如了。无论如何，我们总比波尔布特好一点嘛！不仅是现在比他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错误那么严重，也比他好一些吧！还有一些同志要追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追查来追查去，就是毛主席的个人品质不好。小平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问题，是解释不了的。这样容易把老人家的错误说过头，给老人家脸上抹黑，也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大大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在那次讨论中，还有个别的话说得更尖端，我这里就不讲了。但是套个来看，那次讨论对于《决议》的进一步完善，是大有帮助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尖端的意见，对于促进《决议》的完善，也有一定作用。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后来又写了一个稿子，提交五十多位老同志征求意见。这些老同志熟悉党史和我们党内的情况，提了很多好的修改、补充的意见。这是第三次。然后又改了一次，提交有七十五位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前后共讨论了十个半天。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了以后，又把修改稿发给到会同志提意见，然后再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提交扩大会议原则通过。这实际上是第五次大修改了。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就是扩大会议原则通过的稿子。六中全会共讨论了八个半天。我粗粗地统计了一下，六中全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被接受到稿子上的，就有一百多处。因此，说这个《决议》是中央集体领导下的集体创作，是符合实际的。

多次讨论中间的各种意见，大体上是这么四种情况：一种是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多数。第二种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但

是对某一段的写法，某一个论点的表达，某一段的结构安排，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忌或不满足，要求起草的同志认真斟酌。这种忌见也很重要，逼着写作小组去改。第三种是不赞成的忌见。比如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一定要举，不能丢。可是有少数同志就是不赞成。他们说可以不提毛泽东思想嘛，八大就没有提嘛，不提也很好嘛，现在错误那么多，提了以后不是更加麻烦嘛。有些同志还讲，毛泽东思想现在能提起来的，究竟有几条？除了三大法宝以外，还能数出什么来？本来那四千人稿子里头说，经过同教条主义的斗争，总结了我们的实践经验，经过了反复的检验，毛泽东思想中间形成了三条基本原则：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群众路线，一个叫独立自主。多数同志对这三条基本原则认为概括的很好。可是有的同志就说实事求是这有什么新东西呀，中国汉朝就有这种词汇了，一千多年以前就有实事求是的语言了。资本家他要做生意赚钱，他也得非实事求是不可，这个标什么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独立自主是个原则吗，那个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是同样地也要独立自主，这个对毛泽东思想还标得了什么贡献啊！对群众路线，他说马克思主义讲唯物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过是用另外几个字来表达这个意思而已，也说不上增加了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一些人，说老实话，主要来自于我们做理论工作中间的少数同志。所以小平同志就反复讲，毛泽东思想去不得，这个旗帜必须举。这个《决议》必须全而地概括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种情况是反对的忌见或者完全错误的忌见。小平同志讲，在讨论中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对于这种状况，中央采取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首先考虑到了三十二年这么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我们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很严重，在讨论这样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有各种各样

的忌见。对于这些错误的忌见，要分别情况，进行分析，不一定批判。因为这是在组织范围之内讲，是党内生活的民主权利嘛。

总之，这次《决议》的起草、讨论过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我入党时间比同志们晚得多，来到中央工作时间更晚。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的活跃，在这次讨论《决议》的过程中间，包括在六中全会的会议上，我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表明了我们党中央在政治上的成熟，表明了我们要恢复和发扬延安整风时期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如实地讲，没有这一条，《决议》也写不到现在这个程度。发表的《决议》比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完善得多，充实得多，水平高得多，结构、文字也严谨多了。这是第二条原因。

第三条原因，起草小组同志确实也下了苦功夫。提交会议正式讨论的稿子是五、六次，而起草小组内修改过的稿子，谁也数不清楚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是胡乔木同志，他在这个《决议》上花了很多精力，费了很多的心思。他自己说，他尽管有病，也要振作精神，负责把这个《决议》改好、写好。六中全会之前，他到医院施行手术，把胆囊都割了。在医院治病期间，他也关心这个《决议》的修改，多次打电话提意见，刚一下床，就把我找去，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那个意见不能接受，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决议》上”。过去第一个《决议》是他主要负责起草的。现在第二个《决议》也是他当起草小组的组长，每次修改的设计方案，都是他提出来的，发出去讨论之前，他都要认真地修改一遍，其中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亲自写的。所以小平同志讲，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起草《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煞费了苦心。没有这一条，说公道话，这个《决议》的基本精神也许体现得出来，大家的忌见也可能吸收，可是要有现在这个

面貌，是难以做到的。

下面我想按照《决议》的八个下分，一个下分一个下分地介绍一下和解释一下。

第一下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后来的几次稿子都没有这个下分，仅限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若干问题。增加这下分，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总见写上去的。在没有这下分的时候，小平同志除了讲三条基本原则之外，还一再地讲，要使这个《决议》既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功过是非，接受教训，又能够鼓舞革命精神，不至于使人感到消沉或者低沉，而能够受到鼓舞，提高干劲，增强信心。可是改来改去整个《决议》的调子还是显得低沉。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需要写一段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在建国以后的三十二年中，毛主席是一九七六年逝世，他在世的时候是二十七年，去世以后，从粉碎“四人帮”谈起，还不到五年。这五年又有两年时间的徘徊，三中全会到现在还不到三年。从领导于下来讲，一致承认三中全会以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解决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问题，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显著地进步。但是时间也只有两年多，不到三年。在主席去世以前这二十七年中，十年“文化大革命”，现在不叫路线错误，叫左倾严重错误或者十年内乱，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造成了一个大灾难。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即1957到1966这十年，对这十年总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多。“大跃进”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庐山会议后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这给人民造成的损失，确实相当严重。1957年以后，毛主席对国内阶级形势的分析，错误愈来愈严重，十年的严重错误，谁也不好粉

饰。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的不同意见，不容易统一。那么大家能统一意见的，就是开国以后的前七年。几次讨论中，大家对这七年基本上都没有意见，个别问题上有点不同看法。毛主席逝世前的二十七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毛主席的功绩，一生来看，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三十二年成就和错误来比较，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你不管怎么写，大家很难一致，很难令人信服。所以陈云同志就向小平同志建议，要使人们接受毛主席的一生功劳远远超过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看法，单讲建国以后他的贡献不够，还必须把建国以前二十八年他的贡献写上去。这样就是五十五年，首先有个二十八年毛主席是正确的，加上七年，就是三十二年，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五年，就是三十七年了。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如果作出全百的估价，应该认为这十年尽管错误不少，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这样写出来以后，党内可以通过，人民中间也可以信服。陈云同志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小平同志马上指示起草小组，要体现陈云同志的意见。这一下分的标题，原来叫做前言，经过全会讨论之后，改成“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下分原来的字数，大概只有两三千字，经过全会讨论补充，现在已经有五千多字了，增加了将近一倍。这样就可以从全下历史来看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从全下党的历史来看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地位，对中国人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我们经常讲毛主席的一段话：看干下要从他的全下历史来看。现在有了这一下分以后，我们对老人家的功过，也就有了一个全百的历史的评价。对毛主席的全下历史加以分析之后，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科学态度的人，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党五十五年中间，他的功劳远远超过他的过失，他的功劳是第一

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就可以更加令人信服了。过去的稿子在写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时候，也写了他在大革命的时候重视农民运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制定一系列的军事战略，组织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遵义会议怎么挽救危局，抗日战争提出制定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都写了，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放在全下历史中去写，没有从全方面的观点去写，而只是单纯地讲老人家有这个贡献，有那个贡献。现在的稿子既讲了军事武装斗争，也讲了群众斗争；既讲了根据地，也讲了白区；既讲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讲了各种群众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白区的地下工作、地下组织的建设。讲根据地，既讲了井冈山，也讲了在这个时期各个地方创造的根据地。讲创造的红军，既讲了一方百军，也讲了二方百军、四方百军以及其他各个根据地里头的红军下队。到了内战时期，一切要革命的人，不愿忘接受蒋介石屠刀政策的人，到处搞武装起义，到处组织红军，到处建设根据地，这是活的历史。也正因为讲了各个方面，也就很自然的把毛主席的作用突出出来了。我们这里很多老红军，很多老革命，从自己的亲身经验都一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虽然也搞红军，也搞根据地，但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那套最正确。好花需要绿叶扶持，一朵孤零零的好花，你不管怎么样称赞，没有个比较，就显不出这个花的好来。有各种绿叶加以陪衬，一比较，这个花之好，大家一看就清楚了。而且这样一写，可以说皆大欢喜。在创业时期，每个人都贡献了一份力量，写在党的《决议》中间，这不是领导人个人的问题，而是全体根据地人民，全体指战员的问题。但是，因为限于篇幅，有些应该提的后来也没提到。在讨论中间，邓大姐，小平同志说宁都暴动应该在《决议》里提一句。宁都暴动是十年内战时期，赵博生同志，董振堂同志领导的二、三万人，通过我们地下同

志的工作，在江西苏区起义。可是后来说宁都起义如果写了，那么该写的暴动还多得很呀！济南暴动、渭南暴动，就得都写上，那各种成功的、失败的暴动就有几十次，篇幅就会很长。所以，后来只好写了几个代表性的起义。南昌起义是必须写的，广州起义也写了，秋收起义也写了。有同志提出是不是还要写湘南暴动。后来写了一句朱德、陈毅同志的下队到井冈山会师，就把湘南起义的思想包括进去了，湘南起义这四个字就可以不出现了。

这样把全下的工作，各个战线的工作都列举出来，就更加显示了毛主席在十年内战中间的贡献，他杰出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也就更能服人了。所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制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确实是全党的心愿，全党的同志共同创造的。[✓]在这个根据地里头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而且他善于把别的根据地里头的贡献，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确定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主席不仅创造了第一个根据地。}①，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把主要力量转到农村，经过农村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解放的道路。这种写法，就比原来那种单单写毛主席个人贡献的写法更符合实际，更能够突出毛主席的主导作用。群雄并起，也有个领袖成龙的问题，没有群雄，这个领袖也就没有可以领导的了。

这个《决议》，还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写了我们党的历史和毛主席的贡献。历史的转折关头有两类：一类是从胜利转到失败，怎么样挽救失败，走向新的胜利。属于这一类的就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怎么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转折。对于这个转折，大家都有贡献，而贡献最重大的是毛主席，就是走出了一条井冈山的道路。还有就是反五次“围剿”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这是我们从失败转向胜利的第二个重要关头，而且

是非常紧急的关头。这里也显示出了毛主席的重要作用。另一类就是从胜利又进到新的胜利的重要关头。这里也写了两个：一个是西安事变的解决到抗日战争的发动。由于我们党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停火，促成了张学良打回东北去的决心。有了这个决心以后，他就感到非停止内战不可。要继续打内战的是蒋介石，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把蒋介石抓了起来。抓起来是杀掉还是放走，这又成了能不能够实现团结，准备抗战的大问题。毛主席、周总理实现了这个转变。抗战发动以后，毛主席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独立自主发~~是~~游击战争的政策。大概今明两天就要发表抗战初期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发~~是~~游击战争的一组电报。这些电报非常重要。从这几封电报可以看出，毛主席虽然住在延安那么一个很闭塞的地方，但他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却了如指掌，他对整个战争，特别是对怎么样使用我们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军队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作了正确的部署。这些指示对后来根据地的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从胜利到新的胜利的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第二个，《决议》写了，但话不多，就是延安整风、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一个是胜利到失败，另一个是从胜利到新的胜利，这些都是从二十八年中历史转折重要关头上来写毛主席杰出作用的。在这些重要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作为一个领袖、一个统帅，确实起了扭转乾坤的重大作用。毛主席在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要全~~下~~写二十八年的历史，那需要一本书，《决议》只能写重要的关键时刻。这样一写，党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毛主席领导我们赢得这些胜利的功劳就看得很清楚了，就可以使人们看出，毛主席的功劳不是写文章的人写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过

程中间，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间显示出来的。

最后一个方面，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来评价、观察毛主席的功过、贡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下分中，列举了很多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其中大半分是在建国以前写的。《毛选》四卷是解放前二十八年写的，只有第五卷才是建国以后写的。至于第五卷还需要修改、斟酌，那是另外一回事。陈云同志讲，这些著作，在我们党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得出来。毛主席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理论水平，只有他才能够写出这些好的著作来。毛主席用他的思想、用他的科学著作，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陈云同志说，这一代人不仅包括三八式的干下，也包括他自己在内，这些人一直是我们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耀邦同志说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下，那就不仅是三八式，还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的干下。解放初期，我们党内、社会中间、知识分子里头确实出现了一个重新学习的运动。学什么？学习马列，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总之，在《决议》中，一个是从党的全下历史、毛主席的全下历史，一个是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再一个从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来写我们党，来写毛主席的。把这些写清楚以后，《决议》这一段的最后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明正确的道路，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陈云同志讲，如果没有毛主席，可能我们现在还在做秘密工作。这个话虽然是个假设，但可以从其他国家共家党的发尸中找到旁证。日本共产党比我们晚一年，意大利共产党比我们早一、二年，法国共

产党同我们差不多，他们那里就没有一个毛泽东，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印度共产党也是个大党，无产阶级队伍，比我们中国大得多，可到现在还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一个规律，可是领袖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有没有正确的领袖，关系革命成功的早晚。在革命斗争中，为了集中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革命经验，确实需要有领袖。历史发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说过，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表现的。这样来看待领袖的作用，不是夸大，而是符合实际的。

接着讲了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很快要发表一篇毛主席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大概十五号在《红旗》上发表。那个讲话，对我们学习《决议》，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讲到，人民斗争一百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八十多年，中国人民是不愿忍受压迫的。压迫了就起来反抗，被打下去又起来反抗。各种方法试验过了，各种道路都寻找了，只有在成立共产党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党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同党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陈云同志讲，彭、罗、陆、柏、彭、黄、张、周，被查得那么苦，“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干下被斗得那么厉害，可是绝大多数对毛主席

的信心没有动摇，他们说只要毛主席在，我们的问题可以说清楚，就可以解决。由此可见，我们这些受过毛主席教育的干部，对毛主席的拥护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决议》讲的这三条：党公认为领导核心，毛主席公认为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彭真同志有次发言讲到，解放初期毛主席的形象、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很难说是靠我们宣传造成的，（宣传也宣传了一下，但那时广播有限，电视没有，新闻报纸也有数，写文章写得好的也不多）而主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广大群众都自觉地去维护党的、国家的、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

《决议》的第一部分，尽管文字上增加了篇幅，写了四、五千字，那也应该说是很短的。写了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以后再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讲他的功劳远远超过他的过失，也就有了根据了。所以小平同志讲，不仅要学理论，学哲学，还要学点历史，首先是党的历史。学了历史以后，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解决了，不那么明确的就明确起来了。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这是对建国三十二年的一个总的估价。首先列举三十二年的十项主要成就。这十项主要成就的内容，基本上同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一致，但写法有点改变。叶帅讲了五段，没列一、二、三、四。这次分解成十条，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有一条。总结三十二年成就，是为了动员大家的积极性，增加自己的信心。同时，加了一些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因为光是概括语言，没有数字比较，对我们成就的认识、估价，印象就不那么鲜明。把这些数字一列，就可以看出三十二年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成绩相当可观。本来还有一、二句话，说同解放初

期，同解放前条件和我们差不多的大国（具体指印度）比，他们解放独立以后取得的成绩比我们小得多。后来讨论中，说不必比了，就把这个话删掉了。肯定了成绩以后，也扼要指出了我们三十二年中间重大的错误。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这些重大错误，我们可以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绩，这也符合事实。

整个这一段，都是用正面论述的方法来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总的结论：成绩是主要的。这里没有使用批评的口气，也没有使用论战的方法。因为这些年来，低估甚至抹杀我们成就的观点、舆论相当地流行，所以有必要用正面论述的方法来回答一些贬低、抹杀这些成绩的错误观点。在肯定我们成绩的时候，一头一尾特别指明了三十二年我们党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巨大成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对那些错误观点的一个正面回答。那些错误观点认为，三十二年我们没有成绩或者成绩很小，就是因为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是不可能的。这点非常重要。在讲了成绩、缺点以后，也总结了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问题是犯了错误以后怎样对待错误，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我们党有没有战斗力，是不是一个郑重的党，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党，不在于犯错误不犯错误。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的东方大国中搞社会主义，完全是前人没有搞过的事情，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问题在于犯了错误以后是正视错误还是不正视错误，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主席有两方面的经验、两方面的教训。有的时候他犯了错误，改正得很快很

坚决，但有的时候却一直坚持错误。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写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我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是这样，在反五次“围剿”失败以后是这样，在“大跃进”犯了错误以后是这样，三年困难和调整时期也是这样，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也还是这样。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里，我想补充几句话。所谓“坚持真理”，就包含着保卫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保卫人民已经得到的利益。为什么要修正错误？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错误妨碍了人民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既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不符合人民的利益，那就应该改正这种错误。所以对三十二年如何估价，实质上不只是对我们党的评价问题，最重要的是涉及到人民，对人民的利益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所谓“坚持真理”，就是坚持人民取得的胜利，坚持人民已经得到的利益。抹杀我们的成就，实际上是藐视人民，不把人民放在心里，不关心人民的利益。尽管你口头上讲人民人民，可是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民。因为三十二年的成就，不光是靠我们共产党干出来的，而且是几亿人民干出来的。人民付出了多大的辛苦，付出了多少的劳动，以至于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人民取得的成就，采取抹杀的态度，说得客气一点，是已经离开了人民的立场。轻意地贬低、抹杀我们成就的人，眼界很小，看这个不如意，看那个不如意，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也不是成就，那也不是成就，把近十亿人民三十二年的奋斗用一种轻飘的语言一笔抹杀了。对这种

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这不只是维护共产党威信的问题，而是一个维护人民利益的问题。同样，对于已经犯了的错误，我们必须改正。这次《决议》，能够得到国际国内好评，党内党外一致的称赞，正是因为我们党采取了这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有了错误，哪怕是我们的领袖的错误，我们也要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批评。

三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这一部分在几轮讨论中间，大家都同意。只有个别的同志提出另外一种意见，说毛主席从开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对三大改造虽然没说什么，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看法。除了这个别同志以外，大家对三大改造的估价都是肯定的，只在个别问题上，有点不同的意见。可是，在理论工作者中间，这一、二年来，这种那种意见却慢慢多起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江苏《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文章不但对三大改造，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党，可以说提出了根本否定的意见，这是我个人看到的一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后来对他进行批评，他表示承认错误，说我这个文章也都是东抄西抄的。确实这种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要承认，经过他东抄西抄一改造，比人家走得更远了。所以，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印发一下，作为值得注意的一种观点，结合着学习《决议》，是有好处的。他这篇文章矛头集中地指向毛主席，说毛主席表面上批评了狭隘经验论，实际上偷偷地搬运了狭隘经验论；表面上批评了历史唯心论，实际上偷偷地搬运了历史唯心论。就是说毛主席的历史观，世界观是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用这样一种世界观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其中包括指导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离开科学社会主义。以下把他两段尖锐

的话给同志们介绍一下。他说，一九五一年八月，我们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和《毛选》出版委员会认真修订过的。^{选集第一卷，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因此上面的这些观点（指狭隘经验论、历史唯心论）已经不是反映一九三七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看法，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共同的认识了。这就等于说我们党在建国以后，历史观、世界观是狭隘经验论、历史唯心论。说因为是这样的历史观、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严重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就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形成农业社会主义的统治。他实际上是讲我们搞三大改造，特别是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搞了农业社会主义。他说，在小农乌托邦幻想的形式下，我们的国家沿着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的道路向封建主义滑行。说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头，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分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宿的这么一个派别。接着他又讲，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教育，通过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一定能用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农业社会主义。上面介绍的这大篇话是很厉害的，他所谓的这个新的派别要战胜老的派别，实质是一种挑拨和煽动。我个人的看法，在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也是没有这样的文章的。当然，我们对他还是采取帮助的态度，批评教育，不用反右斗争的方法来对待这样一种思想，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我们注意。这样的思想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代表了一些人观点的一个典型性文章。考虑到上面介绍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写《决议》这一部分时，必须讲清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必要的，正确的，而且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决议》特意增加了这么一个内容，

指出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一部分起草小组的同志搞了多少遍，都没搞好，最后是乔木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在这些内容之后，又讲了我们实行三大改造采取了一些什么步骤，遵守些什么原则。跟原来几次稿子比较，除了字句和个别提法有些变动外，大体上都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想作这么几点说明：

首先，这一段开头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同耀邦同志曾经讲过的，在这七年里头我们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个话的意思完全一样。我们曾经有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是全国规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改造以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提法都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这样对过去的一个提法看来需要做点修正。过去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两种讲法：当时的总路线宣传纲要是讲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另外有些文章（包括毛主席的文章）是说，这个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来看，比较准确的说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好。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毛主席一贯的理论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当时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我们按照这个纲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现在不是有的人讲中国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吗？实际上应该说建国以后经过了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是过渡时期的一个小段落，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前。这一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了。这一段里头，我们完成了一个土改，完成了一个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

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我们就发布了一个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回过头来看，写得是很好的，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后来发到各大区以及各省市，要求根据这个决议，在土改以后，首先是在老解放区开展农业互助活动，这当然带有局部性质，带有试点性质。这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实行了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加工订货），并且进行了“五反”运动，搞工人监督生产等等。另外一小段，是从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总路线宣布以后，我们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这里，《决议》有一个新提法，多年以来我们都叫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这个《决议》起叫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用私有制一词代替所有制一词，更能准确地反映三大改造的任务和性质。因为所有制，是一个很抽象的用语，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公有的、有私有的，公有的还有这种那种形式。所以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就是把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这一点完成了。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要继续进行改造，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为止。做了这样表达以后，实际上也就回答了理论界中间一些同志的问题。因为有人认为全国胜利以后，土地改革以后不应该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引起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句话，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由此得出结论，解放以后应该允许资本主义有个大的发展，甚至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发展。说我们解放以后搞社会主义社会走得太快了，应该回过头补资本主义发展不够的课，讲得好一点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搞五种经济成份。有的同志写文章，说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讲得很好嘛，应该一直按照那个讲话进行下去，不应该来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

下面，我就 11 节和 12 节的内容解释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有些同志包括南京大学学报那篇文章，反复引证马恩列斯的著作来说明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我国生产力很落后，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搞了就走了样，搞成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者是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说过没说过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说过这样的话。问题是生产关系也好，生产力也好，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规定一个简单的数量界限。所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谁也规定不出来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搞社会主义，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不能搞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书也好，恩格斯的书也好，都是讲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开始同它的外壳，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解决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要冲破这个外壳。《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申讲，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来到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而且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上，马克思他们曾经几次说革命形势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进行了，可都没有被证实。但这个理论一直是坚持的。最近有同志查了查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提供了一些数字，这很能启发我们想问题。一八七〇年，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它比较落后一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钢产量有多少，才有52万吨。而在一九五二年我们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国钢的产量就达到了90多万吨，超过马克思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候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钢产量的一倍。他们那时候的铁才有1100多万吨，石油才80多万吨。如果同我们一九五七年相比，我们的钢、石油都远远超过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产量。列宁说过，资本

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当时，美国一九〇〇年钢产量1020万吨，铁1380万吨，煤24000万吨；英国钢产量是598万吨，铁910万吨，煤22000万吨；德国钢737万吨，铁852万吨，煤16000万吨；法国钢193万吨，铁270万吨，煤3000多万吨。全世界的总产量：钢22830万吨，铁4100万吨，石油2000多万吨。列宁讲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垂死的阶段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也不过如此。而我们到了一九七八年的生产水平，就远远超过了列宁所说的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每一个发达国家。我国生产力发展落后是落后，那看怎么来比。引用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单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产品的产量来判断该不该搞社会主义，这是很不科学的。因为革命不是纯经济的过程，就一个国家来讲，是这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再加上国际条件的作用，这些国内外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形成的一种形势。列宁讲的革命形势，主要是三条：一条是旧的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第二条是革命的阶级和团结在它周围的群众再也不愿意照原来的办法被压迫，被统治下去了，非起来革命不可了；第三条是中间的力量发生了动摇，起码对革命不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中立的甚至是同情的态度。而这样三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讲，为什么在俄国首先搞了二月革命，接着搞了十月革命，为什么俄国成了列宁主义产生的故乡。他分析了世界的矛盾，也分析了俄国的各种矛盾，分析的结果是，尽管俄国还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经济比欧洲、美国落后得多，可是在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中间，它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利用这一点，俄国无产阶级从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冲破了，取得了革命

胜利而且站住了脚。我们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当然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把三个帝国主义国家打垮了，三个帝国主义削弱了。美国经济上虽然增强了，但它也有很多的困难，再加上国内这种因素、那种因素等等。所以，单记住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一句话，从原理来讲不错。没有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没有发生矛盾。那革命根本不可能，这种要求就提不出来。可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其它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化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和其它一些同志的文章认为，三大改造时我们把化与改的先后次序颠倒了。说既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就应该先集中力量来搞工业化，等工业化发展了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改造。有的甚至说我们越是到后来越是把国家工业化忘记了，只记住了三大改造，只记得阶级斗争了。首先，这样一种看法不符合事实。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搞了一百五十六项工业项目，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中心。而且到了五六年，陈云同志、周总理提出我们的建设中间已经出现了左倾冒进的倾向。最近，陈云同志又讲了五六年以后我们经济建设上的指导思想主体的错误就是“左”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还是不量力而行搞得太多，因此还要调整。这是事实嘛！从五六年到现在，除了六二年那次调整确实下了大决心退够以外，其它的年份我们搞经济建设不是说没有搞，不是不想搞，也不是调少了，而是搞多了、搞急了、不量力而行。说我们忘记国家工业化，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次，要讲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头，譬如全国解放以前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段，进行三大改造的时期，拿主要的力量来抓阶级斗争。

这个没有错，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错，提抓革命、促生产也没有错。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的时候，还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当然不对，应该进行批评。可是当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时候，抓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促进生产，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抓三大改造，对于我们解放生产力，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看这个事实或否认这个事实是不对的。

第三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的文章没有指名地批评了毛主席关于“在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论断，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而是搞农业社会主义的基石和理论根据。他引证了列宁关于农民是有两重性的阶级的那段论述，认为说农民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列宁的说法是互相冲突的。然后转了命题，做出结论说，农民不能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否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者同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提法，这是两个含义。农民自己确实不能自发地变为社会主义者。不仅农民，就是工人也不能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者。列宁在《怎么办》这本书里头就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说工人按他自发的地位，也只能够提出经济要求，虽然他有时也提政治要求，但无非是要求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有成立工会的权利，有罢工的权利。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最根本的是能够不能够、需要不需要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

产阶级自己统治的国家机器。这样的思想，工人中间是不能够自发地产生的。只有先进的思想家，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了人类历史的经验，形成了科学的体系，然后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所以，不但农民，即使工人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我们还不要忽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党从大革命后期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领导农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决议》里讲，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它既然有倾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加上无产阶级政党用先进的思想去教育启发它，共同搞社会主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有什么不可以理解，有什么错误？这个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说过，无产阶级要胜利，必须有农民战争来相配合。列宁也讲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到现在，应当公道地说，在实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理论问题以及实践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我们党所得出的经验，所形成的理论，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工农联盟的巩固程度，比苏联好得多。几十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在长期斗争中间形成了无比巩固的联盟。我们依靠这个联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解放以后，毛主席用主要力量领导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形成了一种态势，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胜利，是我们党和毛主席在工农联盟的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带有

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也正是在这个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纪律程度很高的、战斗力很强的人民革命军队。我们长期搞农村革命根据地，党从农民中间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文的优秀干部。一直到今天，农民中间涌现出来的干部还是占我们干部队伍的多数。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几十年的战斗，创造了世界上许多的奇迹，其中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我们的将领、卓越领导人、大批干部、很多英雄，大部分是农民。经过这么长期斗争的考验，又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先进思想教育的农民，说一句他们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有什么错？我们不正是因为这样，才搞成了许多事业，才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现在，农民在全国人口中还占大多数，十亿人口就有八亿是农民。上面讲的这些话，作者也听到过，可是对农民的看法，在一些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经过农村斗争锻炼的、脱离农民的知识分子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心理，看不起农民，不了解农民，这个状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在最近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紫阳同志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坚定的，农民不但过去而且现在也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很多地方搞包产到户，甚至搞大包干，有些人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向单干，个别地区由于领导无力，也确实出现过分田单干的现象。实行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跟着在农民中间产生了一种走向新的联合的强烈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过去进行农

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农民也不愿意动摇。而生产资料在农村来讲，最重要的是土地，把土地从私有变为公有，这是农民的要求。可以说一下，如果土改以后，土地小块私有延长三、五年，或十年八年，那样，土地买卖和土地出租就会盛行起来，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的土地，由于阶级分化又卖掉土地，这就会造成阶级分化大发展。所以耀邦同志在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要肯定，不能动摇，我们过去是搞得对的，今后还要坚持；另一个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怎么样搞经营管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错误，不在前一条，主要是在后一条上，“一刀切”，到处搬大寨的“经验”。

第四个问题，《决议》中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在讨论中，有人提出，是不是加上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左倾错误的萌芽。经过反复考虑，现在这样写比较符合实际，加上“左倾错误的萌芽”这样的话，反而把问题搞抽象了。同时还讨论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讲话应当怎么看。起草小组的同志重新读了这篇讲话，认为从主要方面看，大部分内容还是应当肯定的。但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一开始批评小脚女人，后来讲到工农联盟的时候，说有些人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所以要下马。主席说，正是为了工农联盟，合作化应该上马。说主张下马的同志的立场是资产阶级

的、富农的、富裕中农的。这些说法后来被证明起码是拔得高了点。
邓子恢同志并不是主张不要搞合作化，而是主张稳妥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快。如果说有争论的话，不是搞不搞合作化的争论，而是快慢的争论。

这个部分还充分肯定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对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主要任务的提出也是正确的。虽然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但还有阶级斗争，要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你搞阶级斗争对还是不对，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好还是不好，就看你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不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四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部分的谱论，意见最多，争论很大，稿子反复次数也很多。从起草的同志来说，思想上也受了某些限制，主要是被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从而造成的三年困难，以及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逐步提出、逐步升级等一类的问题束缚住了，看不到全局，思想打不开，看不清发展的过程，所以每个段落的表达都没有搞好。也有不少同志对其中的结论表示不同意，甚至有的同志认为，五七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一条左倾路线贯彻始终。那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长达二十年之

久，他们连“在曲折中前进”的提法都不同意，说是在曲折中后退。经过小平同志多次批评以后，而且他亲自提出这一段应当怎么改，从题目上改起。于是乔木同志就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改完后，有些同志还是表示不同意，可是中央认为这样合乎实际。小平同志对这部分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就是这么个意思：首先要肯定这十年的成就，然后再来写这些成就是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的。现在的稿子基本上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布局的。《决议》的第 16 节就是肯定我们的成就，简单地说：第一，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碰了钉子。吃了亏，有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对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在很多问题上要借鉴这些经验，其中有不少要继续贯彻。《决议》第 16 条中，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朱德同志、邓子恢同志都提出了些什么意见。同前七年那部分相比，这里表达方式不同，前七年都是讲党中央，当然也讲到毛主席，其他同志就没有列举，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前七年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应当说是健全的，中央内部的意见，只有到五六年反冒进时才出现分歧。反冒进是对的，对当时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毛主席不大满意，在五七年杭州会议上提出来，说五六年的反冒进使他心情很压抑，泼了群

众的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八大文件起草过程中，一直是按《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倾向是右倾保守。到陈云同志和周总理提出，五六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要反冒进，所以八大的稿子中就确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这样的方针。所以这种表述上的差别，反映了五七年以后，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的意见分歧慢慢表露出来。当然在十年中又是有分有合的，有的时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毛主席靠拢。比如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提出两个阶级的矛盾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八大的提法，但中央的同志对此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没有表示反对。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毛主席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向多数人靠拢。最明显的是十人大会，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接着，是西楼会议，周总理、陈云同志提出渡过困难时期的方针政策，常委讨论时一致同意。当时，毛主席在武汉没参加会议，后来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把会议讨论的文件带到武汉，向主席汇报讨论的情况。毛主席说，多数都赞成，我也赞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席闹了乱子，他首先发觉后主动纠正错误。最明显的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五风”，这个乱子天公地道是老人家闹出来的，可是正在大家搞这件事情的时候，毛病又是毛主席首先发现，首先出来纠正的。但开始时，他是少数，大家头脑发热，纠正遇到阻力。尽管这样，这十年期间，中央的集体领导应当说基本上是保持了，政治局的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国务院的工作，基本上能正常进行。正因

基础的，才能完成调整时期的任务，不仅能够快恢复，而且很快。党的发展，取得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成绩。《决议》按照历史的面貌，记述了这十年的曲折，有时错误严重，有时纠正错误后走上正确的道路的情况。这里讲了毛主席对所犯错误的责任，也讲了其他同志在纠正错误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讲了毛主席在纠正这些错误中间所作出的贡献。然后，讲了一段毛主席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思想的逐步发展情况，一方面这些错误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错误对整个经济工作没有发生全局性影响，“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个问题最明显地表现是八届十中全会，老人家重提阶级斗争，后来所说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整个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讲了几句话，关系非常重大。他说：我们这次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可是这个问题就在全会讨论完就行了，不要往下传达，接受一九五九年的教训。如果五九年批评彭德怀，只在中央全会上批评一下，不往下传达，就不会产生层层反右倾，就不会中断纠“左”的工作。大家回去不要传达，以免干扰经济工作的进行，经济工作的调整照原来的计划进行。这几句话，对当时来讲确实关系重大，如果照庐山会议的办法，层层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就无法进行，不但不能恢复，更谈不上发展。这一点也证明，《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毛主席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虽然起

越来越严重，以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这个时期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要论点，还是很不相同的。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还不是、不等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形成过程，拿一切哲学语言表达，它是处在量变的过程，还没有进入到质的变化。所以，小平同志讲，我们这次对毛主席错误的评价，恰如其份，一寸掌握得比较好。总的来说，这十年间，毛主席在阶级斗争、大跃进方面的错误，虽然是严重的，有的是越来越严重，但终究是一般性错误。

(接下页)

小平同志对这一部分原来最不满意的一点，说你们写来写去给人家一个印象。别的人都是正确的，只有一个人是错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错误都要由毛主席来负责，这不合乎实际，这是很不公正的。他反复讲这个时期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不能够完全推给老人家一个人。讲头脑发热，他说我自己也头脑发热，反右派扩大化是我~~老~~书记处主持工作的时候作了报告的。对于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我们当时都没有反对，都接受了。他在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主要是没有经验，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高指标陈云同志一向是不赞成的。可最近他对我们说，钢铁翻一番，在北戴河时提出来，当时我也是相信的。只有到什么时候才怀疑，才不赞成呢？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我同先念同志到西北考察，发现是用那个小高炉、土高炉那样一些办法来炼钢铁，做了调查之后，我才不赞成钢铁翻一番。而刚开始提出来时我也相信呀，我也以为能够实现。所以，这一段的最后，完成是按照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写的，说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为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次《决议》发表之后，普遍反映对毛主席的错误、功过的分析是公正的，与《决议》的这些写法关系很大。这是第四部分。

五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去年七月基本定稿，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这部

分写得很好，是乔木同志从头到尾写下来的。昨天我说是干了一年另四个月，实际上包括看材料等准备工作，从前年十一月就开始了，实际上起草过程二十个月，合一年另八个月。起草的同志讲，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也不满意，其他看了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很难说清楚。后来经乔木同志一改一写，现在这个稿子起点就很高了。首先，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而这些论点也是我们给他加上去的，都是反复对照了主席自己写的文章、讲话、批示的文件，以及所批文件中他自己加的话，别的人的话在这里都没有用上。把毛主席的这些主要论点一列，谁都可以看得清楚，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观点，完全是一个新的面貌，说明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套思想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刚才不是说量变到质变嘛，这个质变到这个时候就完成了。有了这些论点，毛主席既然是这样看问题的，你说还不发动“文化大革命”？非发动不可了，止也止住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进行一次，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以后，别人把它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虽是别人概括的，可是毛主席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而且长期使用这样一个概括，并且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的里程碑。说过去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虽有发展，但那个还不算，还不是新阶段，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为马克

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了，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马克思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列宁虽然提出了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说斯大林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可是理论上没有进行总结。而毛主席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总结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是左倾错误的理论。这次《决议》列举了这些论断之后，写了这么几句话：“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换句话说，就是既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中国实际，也脱离了这两个东西的结合。用一句话说，他的这些理论，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些不能叫做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认为是正确的真理。我们在起草过程中间，感觉到一个最大的难题，很难处理，一直处理不好，就是老人家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啦，后来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一种打架嘛。这是前进嘛！问题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套理论出来以后，他实际上有些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要维护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充分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可老人家的思想理论自己跟自己打架，怎么树哇？怎么高举呀？现在《决议》这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六中全会的同时，我们请党外人士座谈，请他们对《决议》提意见，费孝通说，这个《决议》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杰作。杰作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主席的错误。其实，找到了这样（接下页）

一条出路，也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解决的，因为小平同志再三再四地说，如果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乔木同志说，煞费苦心，改来改去，写来写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自己离开了自己的思想轨道了。《决议》发表以后有些人讲，这样一来就更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这一科学原理谁违背了都要犯错误，就是毛主席违背了也要犯错误。可见这样写，要树立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掉这个旗帜，就顺理成章了。

《决议》把毛主席的错误论点如实地排列出来，指明它的性质之后，接着就来分析、批评他的这些错误的论点。一共写了四条批评。对这个批评，外国人也反映是毫不含糊的，是很严厉的，很严肃的。大家细琢磨一下，就可看到语言是用得很重的，份量是很重的。可是重是重，严厉是严厉，但又是科学的，是掌握了分寸的。甚至于用的语言也是毛主席的语言，用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也用毛主席的好的语言来批评他的错误。第一条，说他的论点“没有事实根据”。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过，批评要有根据。说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是非”也是毛主席经常用的话，一个领袖连是非都混淆了，这个还不严重呵！可是呢，是很有分寸的，没有用“颠倒是非”这样的词；第二条，说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混淆”这也

是主席的语言。混淆敌我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讲，还不严重啊！可是也是有分寸的，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为我，认我为敌；
很
第三条，说他“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这也合乎实际，因为毛主席跟斯诺就讲过，我只有直接诉诸于群众，我没有别的办法啦，写篇文章找宣传部也不写，找北京市也不写，找哪里也不写，只好找上海几个人才能写。接着下边讲，“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这里是讲“脱离”，没有用主席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压迫了群众，镇压了群众等等不讲究分寸的话；第四条，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话很重很重，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可是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这种语言。这里头涉及到要把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批评毛主席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有些用语上可以用于林彪、江青的，决不滥用于毛主席身上，更不用说在性质上他们是反革命罪行，毛主席是左倾严重错误。这几条批评文字不长，一共也只有两页多一点，都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小平同志再三讲，这个问题上，可不仅是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分寸掌握得很好。从发表以后的反映来看，到现在为止，这样的评价对于我们党的影响是好的。讨论中间也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批评得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讲，我们旧中国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为了保护我们尊敬的人，

有些事情得避讳避讳。其实，这一段对毛主席的批评，我们并不是遵循旧道德观念的。该批评的就批评了，当然有些细节，略而不提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这是事实。《决议》里头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有的人就要问，为什么重用？希望写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枝节问题。细节问题了，而且也很难写清楚。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重用别人，偏偏重用了这几个人，究竟原因是什么？包括“批林批孔”中间有一次对总理的批评，这里头讲了开垦“批林批孔”的文件是主席批的。

讲到这里就指明了。至于为什么要“批林批孔”，为什么对总理那件事不高兴，不满意，就略而不提了。这里头还涉及到用不用路线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问题。小平同志讲，这里说的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关于路线、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些问题，最后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一律不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对此乔木同志已有解释，他已经作了详细地说明，请同志们看看就行了。历史上，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有的同志主张这个《决议》应给他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修改时反复考虑来考虑去，那里没有加，因为如果王明犯错误四年就叫左倾路线错误，毛主席十年为什么不叫左倾路线错误？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讲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了，左倾冒险主义招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多万人减少到3万多人，党员从30多万减少到4万多。

然后，《决议》就按照历史的顺序，把“文化大革命”过程分为三

段记载下来。这里头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主席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主要领导人同林彪、江青的斗争以及对毛主席错误的抵制。也按照历史的情况，写了毛主席在那一段里头曾经做了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的确也做了些好事对党有贡献也是事实，不能因为他的严重错误就忽略了这些东西。比如是他和周总理机智地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具体情况不想多讲了。

22节在讲了过程以后，就是讲毛主席对此应负的主要责任。然后讲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里头，前面讲了错误，后面又着重讲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作了不少好事，对党还仍然有很多贡献，这都是事实。这次外国使团反映，《决议》一方面讲他的错误，同时又讲他的贡献，表示了我们对毛主席的谅解，而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毛主席的严重错误，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按照历史的面目，对他的严重错误不含糊。对人民对党的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小平同志在去年八月扩大会议上讲的，我们要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接着这一节原来有这么一段，有那么二三百字，叫林彪、江青反革命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在讨论过程中，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是出于好心，为了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

革命家怎么能同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要错误和正确比嘛，不要把革命和反革命相比嘛。所以，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为了学习对自己人，特别是对毛主席这么一个领袖该怎么批评，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怎么揭露和批判，互相对照，建议同志们有机会的时候，重新把叶帅前年国庆讲话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部分，对照着读一下，还有就是十个反革命的判决书。总而言之，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很严格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在这个《决议》里头，掌握了一条很严格的界限。这个《决议》主要处理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是革命家犯错误的问题，不是要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战的问题。

讲了毛主席的贡献，接着第23节讲了十年中间，我们的很多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群众，一方面同林彪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是一方面也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仍然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来想列点数字，后来讨论的结果说不到了。固定资产十年还增加了一倍半，工业的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还有六点七。当然，这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但是终究由于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包括我们大批领导干部的共同斗争，终于把这些反革命集团打倒了，保证了我们党的性质、国家政权的性质、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

顽强的生命力。

最后这一段，是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讨论修改过程中间，大家都担心，考虑将来还会不会重新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说明是多种原因的综合才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当这种条件消失以后，将来再象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那么一个大规模的、长期的“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了。我们大家交换意见中间认为，由于老人家这么个人，他有这么高的威望，他又离开了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轨道，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这套理论，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今后的历史中间，再出现一个这样的毛泽东，在党内有这么高的权威，他说一句话会全国响应，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包括不理解的人也要想办法理解那样，我个人的看法，起码几十年之内是出现不了这样一个人物的。说得简单一点，没有毛主席，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很难再出现这样一个毛主席。所以这一点上我是很乐观的。除了毛主席在领导上的错误，在《决议》中具体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原因。讨论过程中间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有不少同志觉得这两条原因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了很多。由于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那么千把字，确实要理解这里头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是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深说透，需要有好几篇文章来展开论述。为了便于同志们理解，我想把它稍微分解一下。

拿第一个原因来讲，就说了几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指出是社会主

义运动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究竟如何搞法，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而探索的东西就难免犯错误。可是有的同志说，开国的七年不是经验更少吗？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搞得很好，到了一九六六年以后，时间更长了，经验也更多了，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所以光是讲一层还不行。因此，第二层就讲他老人家一直到去世，总是不愿意
这
停步。不是要探索嘛，他总是不断地在探索，今天看出这么个道理来要大家前进，明天看出那个道理来，又逼着大家去前进。斯大林就曾经讲过，俄国的落后需要鞭策我们才能前进。毛主席老人家他看出一个道理之后，要赶着我们跟上他。那么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又接受了他这个探索，那个探索呢？其中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因为他探索的就是要注意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升级。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环境中间长大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我们经历中时间最长，也最熟悉。而对于新的情况我们却很不熟悉。所以，主席探索出来一个道理之后，虽然我们跟不上，但总还是想办法来跟。到后来也就一步一步地接受了。第三点，老人家和我们都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老人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提倡我们要读马列著作，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讲庐山会议闹了一个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所以，提倡大家都要学马克思主义。他探索出来以后，就反复地要求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他自己也从这些书里头找理论根据，用他自己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

这些理论来证明自己的探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的。我们这些人不管读书读得怎么少，我们总还想作个马克思主义者。加上我们都是认为毛主席在马列主义的修养水平上比我们高，他探索出来了，又认为合乎马克思这个经典著作，那个经典著作，还加以解释，所以都相信他，相信马克思，相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解释。你说是完全盲目的，总觉得共产党员不读马列不行啊？不相信马列不行啊？毛主席比我们高明，不相信他行吗？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里讲，老人家的马列是误解了的马列，老人家的观点是教条化了的观点，可是我们都把它当作货真价实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我们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不是加了注解吗？《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读一遍，觉得主席讲的对，再读一遍，觉得主席讲得更对。不太懂得的，还是看毛主席的解^{容易懂}。还不是这个状况！第四点，就是赫鲁晓夫跟我们闹别扭。开始我们讲国际反修是他们挑起来的，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组织围攻，我们被迫应战，感觉到受欺侮。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他就在他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论战，那我们不能不应付哇！当时，人们都是一致称赞我们党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至于这一段反修，哪些必要，哪些有错误，要专门研究。这次《决议》肯定了一个，说这次国际斗争是对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斗争，没有提国际反修。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的。受气呀，我们那时候确实受气呀：在六二年以前我们讲的反修是反国际上的修，中国国内没有修。而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时重提阶级斗争，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

斗争熄灭论”，这就是修正主义观点，接着后来主席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前面反了一个赫鲁晓夫，确实赫鲁晓夫比斯大林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在我们思想上是有个过程的，但也确实是逐步地转过来了。如果没有一个国际上的反修，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码也还要推迟。因为思想上有个紧迫感啦，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修正主义啦，我们没有这个危险吗？所以主席后来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党中央有这么高威望的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脑子里能不想一想？这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我们可以回过头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批评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但当时，受到这种批评之后，完全直接了当地站出来说你搞“文化大革命”就不对，可能有这样的同志，我看大多数党内的干部都是相反，既然主席批评了我们，我们就想办法理解呗！既然不认真就想办法认真，既然不得力就想办法得力嘛！还不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即使被打倒了，即使抓到监狱里头了，被隔离了，那也都是诚诚恳恳地做检查，做交待，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评，开始不愿意上纲，那时候不是有两句话吗？叫做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慢慢地先是承认错误，然后是右倾错误，然后是修正主义错误，然后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然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我自己戴上，只要不开除党籍就行了。一九六八年，主席说，不要把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人统统看成坏人，这中间坚持错误不改的是少数，多数是可以改正错误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听到这个传达以后，哎呀，这总算有希望啦！有出头之日啦，能够改个结论，说不是走资派，而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就心满意足了。自己这样批评自己，也跟着这样批评别人。所以，这些原因都是说明，这种事情不是单有老人家一个人的作用，是当时党内的这样一种状况，这样一种社会的状况，这样一种国际的状况，互相起作用，互相影响造成的。

至于第二条原因，比较容易写清楚，比较容易理解，主要是讲毛主席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啊，骄傲自满啊，超出集体，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呀。这里头讲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在解决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留给我们的一些消极的东西。起草过程中间，把马克思第一国际的章程，拿来看了一下，那个章程里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态他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里头，各个支部同国际的关系，国际里头对共同领袖和组织的关系是很集中的。到了第三国际时，应该说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每个国家的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就把各国共产党管得死死的。列宁自己写了《“左”派幼稚病》中那一段，但是列宁也写了另外一段，即：阶级专政和个人专政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到了斯大林，那就更厉害了。所以，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领袖和政党的关系问题，而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对

我们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这种或那种影响。所以，去年在讨论小平同志八月扩大会的讲说，关于封建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对我们党内的建设，党内关系这方面有重要的影响的时候，乔木同志就讲，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有这个因素，但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一个因素。应该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好。当然喽，封建主义也确实不能低估，这里头也讲了。所以，所有上边这些条件，封建主义呀，毛主席个人的因素啊，党中央没有制止的责任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些消极影响呀，封建主义的影响呀，我们国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就造成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事先很难防止，起来以后，也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六部分 伟大的历史转折

这部分的内容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常委在小组召集人的会上又作了很好的讲话。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华国锋同志的功和过，他职务上的调整，都已说得很清楚了。常委再三打招呼：批评归批评，选举归选举，无论如何还要选他当副主席。结果也选上了。这方面的情况就不需要多讲了。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政治动向是“四人帮”的残余也好，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也好，都想打而且已经在打华国锋同志的旗帜。当然华国锋同志没有参与这件事；可人家要打他的旗帜，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涉及到对华国锋同

志的全面认识问题。高级干部中间这个问题解决了，听过中央四号文件传达的同志也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中下层以及一部分群众中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是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形象和实质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外表很谦虚，可是肚子里打算盘。陈云同志指出，一部分人中间的反映，一是有功，二是谦虚，三是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就行了。这就说明有些人对华国锋的实质问题了解很少。我这里提供一点我所知道的材料供同志们参考。想传达一下耀邦同志讲到的有关内容。

第一件事，是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四人帮”粉碎后不几天，叶帅就向华提出赶快要小平出来工作，恢复原来的职务。华国锋同志没有表示同意。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职务，并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在坐的同志总不会害怕邓小平同志吧！他总不会对我们调皮吧！先念同志马上表示同意。可华国锋同志不吭声，不表态。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华有个讲话，经过整理下发了，建议同志们拿来重新看一看。在这次讲话的起草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的把稿子送给叶帅，叶帅每次看后都有不同意见，很着急，积极提出修改意见，中心是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这个事件有点像国会纵火案。可华的稿子一直肯定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另一条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以及重新出来的问题，叶帅一直要求改变稿子的提法，写的好一些，以利于小平同志快点出来工作。快要定稿了，叶帅亲自打电话给李鑫，李说你不要来了，我们派个人去听你的意见，叶帅又一次提了意见。李回话说，你几次的意见我们都向华主席报告了，许多意见我们已经照着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估价和评论也改的很好了。是会有利于他出来工作的。可是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宣读的和后来下达的讲话稿，还继续肯定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四人帮”另搞一套错了。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口号是经过中央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借口。他竟把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同“四人帮”进行翻案联在一起。这次会议还印发了一个材料，就是所谓李

冬民反革命案件。这个案件^{去年经}已查清，完全是个假案，是适应当时需要制造出来的。可华国锋同志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这个材料来说明批邓是必要的。他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那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他还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当时我们有几个同志看后在一起议论，“水到渠成”是个什么意思？实际上是华国锋同志想把他的班子组织好，把他的路线确定下来，把轨道铺好，然后让邓小平同志上车，按照他铺好的轨道走。第一号司机是汪东兴同志，司机长当然是华国锋同志。意图很清楚，我们开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当时的部署很多同志看的很清楚，实际上是搞个“华汪体制”，然后你邓小平成为下百的一员就是了。大家议论时说不管他怎么样铺轨道，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轨道就要被冲垮，因为这不是小平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大多数干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问题。

第二件就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同志作过几次检查，但他每次检查都说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自己同意，只是负同意别人意见的责任。现在根据文献研究室过去听李鑫同志的传达记录，对于事情的真像可以看出一个轮廓，一个线索。实际上，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这个话的意思就有了，他传达了华的四条指示：第一条，要集中力量批“四人帮”的路线^{连带着批邓}；第二条，“四人帮”^{连带着批邓}；第三条，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第四条，天安门事

件要避开不谈。到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李鑫又传达了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意见说：昨天东兴同志布置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讲话，要把人们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同志的注意力转过来。说天天讲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小平出来工作，这个矛头是对着谁呢？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向华国锋同志施加压力。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在社论起草过程中，一月十四日，李鑫同志又布置任务，说汪东兴同志布置要为华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里谈谈小平同志的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在小范围的讲话，原先只准备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后来变成了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说这个讲话主要是讲邓小平的问题，天安门事件也要讲，但不要展开，要批评小道消息。要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要大家注意收集大字报、传单，注意思想动向。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几个同志说，华本人还找他们系统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听了之后觉得华国锋同志是胸有成竹的。到了一月十七日，李鑫又向起草的同志讲，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群众的言论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肯定毛主席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到了一月二十一日，提纲第三稿中就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二十三日，李鑫同志突然召集起草的人开会，说讲话推迟，要先发社论，要把上述有关内容写进去。这样稍加修改后，经汪东兴定稿，在二月七日，匆匆忙忙发

表了。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并不是起草的同志，甚至不是汪东兴同志，清清楚楚地属于华国锋同志。而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对于这一点至今华国锋同志没把事情真象说清楚。

第三件，一九七七年一月到四月，政治空气非常紧张，首要的是所谓追查政治谣言。这里也向大家提供点查证了的材料。七七年一月六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大家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前期，当时的党中央采取了很开明的措施，广场大放光明，道路两侧设了公共厕所，观礼台也可放花圈，使大家看到同一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时期完全两样了。可是后来天安门陆续出现了一些大字报和打油诗对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同志有所批评，语气也确有些过头的地方。这些东西出来后，措施马上变化了。一月二十日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电话通知，要各省、市、自治区向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如果有，要马上将情况和处理措施报告中央。这个电话稿是经过华国锋同志签发的。同一天，辽宁省委打来电报，说旅大市革委门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内容是：“吴德伙同‘四人帮’制造‘四五事件’罪该万死”，“陈锡联与‘四人帮’的黑关系必须交待”，“陈锡联在辽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污蔑”，“吴德、陈锡联伙同‘四人帮’迫害邓小平同志罪该万死”，“‘四五事件’必须翻过来，为参与‘四五事件’的死难者致哀”，“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紧跟‘四人帮’必须批判”……。如果说这些标语还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可是下面这两条就不同了：一条是“坚决拥护邓颖超同志为人大委员长”，另一条是“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为国务院总理”。

辽宁省委将上述标语抄录以后，写了几句话报中央办公厅，说“对此大字报、标语要加以复盖，对写标语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华国锋同志见到后，就在旁边批了这么几句话：“你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一下子统统定为反革命大字报，不是要教育而是要追查了。如果说他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认识问题的话，那么到七七年还把上述大字报一概当成反革命的，这就太过份了。接着一九七七年二月，经华批发的中央五号六号文件，都要求各地坚决打击政治谣言，说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标语、大字报，说他们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指康生）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指汪、吴）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形势下向我党进攻的新手段。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同年三月，国务院又发出三十号文件提出对上述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从上述几个材料可以看出，那几个月的形势确实是很紧张的。也可看出华国锋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仪，已经达到不可侵犯的程度。如果侵犯就要抓，就要杀，而且这几个月里确实错杀冤杀了一些人。

第四件，华国锋同志决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有关主要内容，决议中已经讲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并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在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这里提供一些材料，供大家思考。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不仅全百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而且提出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四人帮”的斗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围绕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展开的。而所谓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只是他们另搞一套。直到三中全会前，他一直讲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右，右的不能再右了。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又把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下面几句话：“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还有其它一些，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五件事，是关于新的个人崇拜问题。去年十一月九日，胡耀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讲过这样一段话很好。他说，我们的党绝大多数同志都犯了神化毛主席的错误，我们都吃了大苦头，我们的记忆犹新。华国锋同志也应该记忆犹新。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华国锋同志搞了一个双重迷仪。旧的个人迷仪，不是维护新的个人所以有的同志说华国锋同志在搞个人迷仪问题上比毛主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简单地讲八件事：1.当然的继承人；2.英明领袖；3.挂像；4.颂歌；5.题词，不是一般的题词，而是大量的题词；6.照像，不是一般的照像，而是大规模地连续不断的照像；7.写书，出了很多书，湖南就出了一本《华主席重要讲话文章题词汇编》第一号，还准备续

续搞下去七七、七八年出的书不少，包括小孩子的书； 8. 搞欢呼场百搞这个新的个人迷信一度确实成了铺天盖地的东西。这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有三个客观原因，讲清楚这个问题，以便采取正确的政策。1. 初期确实有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对华国锋同志说了一些好话。老一代革命家对新上台的同志说了几句过头的褒扬的词是应该的，可以允许的，应该理解的。我们都跟着说过这些话，我自己也讲了。2. 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专门搞吹鼓手的人，我们党几十年来历来有靠当吹鼓手吃饭的人，专门吹喇叭、抬轿子，这种人确有一个党性问题。3. 是受空气压力的人。在上百空气压力下不讲那么几句觉得日子不好混，决大多数我看还是这样的同志。客观上存在三种情况，因此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不要追究党内个人的责任。但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不纠正；第二，不降温；第三，他有点迷恋。要少宣传个人是乔木提出的。后转示小平同志，他说三中全会公报上要写上去，公报上才有了这段话。华国锋同志让我们几个人在闭幕会上为他准备一篇讲话，我就向他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话好，他采纳了。开了会后我们向华国锋同志提议：是否把你们五位的讲话印发到全党去？我两次向他讲过，他说：我说过了，检讨了，就了吧！还有一件事情：三中全会后，党校有个学员叫王立本，给华国锋同志写了封信说：华主席你到红星养鸡场去，场里把你用过的東西都摆起来不好，应该取下来。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华延迟了半个月时间，在一月十六日回了封信，说什么王立本同志你的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经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鸡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把陈列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

都照此办理。一定要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底下耀邦同志讲：你这里说到的以后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你叫那个王立本同志怎样照此办理？你就应该写一封仗叫中央转发一下嘛！接到这封仗后我用了一番心思。在党校同学毕业会上大讲了一番。我说：华主席批复王立本同志的这封仗，很好。我们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头还有哪些封建作法，办法需要改过来。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今年我们书记处又采取了几个步骤，把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的像减少下来，又发了一个通知。本来华国锋同志有许多机会可以向中央写个报告转发下去。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南京这件事情，搞那么大的欢呼场口，所以纪律委员会一致的意见叫做“明知故犯，阳奉阴违”。他在这个事情上一直不降温。中央全会提出来了，还不降温，还有迷惑。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搞个人迷仗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我建议我们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永远严禁。搞这个东西，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的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为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迷仗永远不能搞了。以上耀邦这段话很好，可是华国锋同志并没有做出一句真心诚意的检查。下口，补充一点我们所知道的^{真正两}事实。对华国锋同志搞个人崇拜最起劲的是汪东兴同志。他主持筹备宣传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四个字的问题，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高举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紧跟就是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一个月后，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汪东兴同志在会上带头鼓吹说：华主席很英明，内秀得很，涵养也特别好。毛主席看得准，选了这个好人来接班。毛主席说要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要坚

决实际执行。我们的华国锋同志做为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做为我们的主席。我们很幸运，确实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这个方面要加以宣传。对这个方面的意义要充分认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要有丝毫的动摇。不要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为了突出华国锋同志还讲过。说领袖只有一个，不要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连在一块。李鑫也特别卖力。他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什么中国的十月革命。他说。为了反对敌人的诬蔑，我们应当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充分估价华主席领导的我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第六件事，关于华国锋同志对经济调整的态度问题。经济工作前两年搞不下去了以致七九年的计划很难编，反复多次也订不下来。直到二、三月间，中央常委几次开会研究，会上陈云同志提出经济要调整，而且不止一年，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说要下决心进行调整。这是最关键性的事。先念、剑英同志也都表示赞成。^大可华国锋同志却一直态度暧昧。当然这个人一向的作风是这样，他不赞成，不明白白的说，而是用别的一种办法。他说光是调整行吗？是不是还有其它的任务呀？是否还有别的字要加上去呀？是不是加上别的字更完塑一点？到一九七九年四月专门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对这八个字是否应该有个中心，有个关键，大会小会争论非常激烈。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讨论时，总是采取这个态度。说有的同志主张调整是关键，有的同志提出调整后会妨碍积极性。究竟怎么好呀？他三番五次表明这个态度。最后还是多数赞成八个字，赞成调整是关键。在文件中起草人又加了个“中心”二字，但在他定稿时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中心不要再提了，就勾掉了。这样，最后总结讲话中总添

讲了调整是关键，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他对调整一直采取消极态度。一直到八〇年三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开座谈会，讨论财政问题。会上华国锋同志有个总结讲话，提纲是他自己起草的，在回答形势好为什么又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的时候，没有讲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也没有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种情况估计得很不够，还继续搞了两年高指标，从而加剧了比例失调的现状，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些话他都没有讲。他整个讲话里头，“调整”两个字根本不提，而是标了一大笔帐，说提高农产品价格多增加了多少支出，城市职工的工资提高，奖金的恢复，又增加了多少支出。这样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就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本来应该说清楚，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善职工生活，增加职工工资，这本身就是改变“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消费和积累关系上比例失调的情况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些就是调整的必不可少的步骤。问题出在哪里？消费是应该增加的，而且本身就是调整的重大步骤，但这部分增加了，应该减少的没有减下来，也就是调整基本建设这件事情。在四月工作会议之后，执行的不好。应该加的加上去了，应该减的减不下来。如果这样来说明出现大量财政赤字，才说的合乎实际。他没有这样说，给人造成的影响是调整搞坏了。不但没有把比例关系调整好，而是愈调整比例关系愈坏，过去还没有赤字，现在调整之后倒出现了大量的赤字。后来他要我们帮助他整理这个讲话记录。

我们就补充了这个意见，而且特别把陈云同志当时说的一段话加在上面。他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陈云同志的一段话是什么话呢？就是讲形势是好的，但确实潜伏着危机。八〇年三月，陈云同志就说了这样的话：吴波同志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必须坚持，现在需要做些好事，但是好事不能做得过多过快，否则力所不及，基本建设不能形成下面铺开摊子，把上面的、大的、要紧的东西挤掉了这样一个局面。例如，现在铁路就被挤掉了，财力的分配，要作好一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书记处要大力抓。我们把整理好的稿子送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对你那个讲话稿作了一些整理，也作了一些补充，还引了陈云同志的话。他收到这个稿子以后，打电话给姚依林同志，说他没有时间看了。可是却要中办秘书局把他的录音稿送给他，他自己作了文字修改，然后正式下达。从以上这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华国锋同志不仅几次阻挠陈云同志进政治局，在陈云同志进了政治局，并且被选为常委和付主席以后，他对陈云同志的意见，起码应该说很不尊重。在中央已经正式确定八字方针以后，他对调整方针采取的这种消极态度，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了两句话，说虽

然确定了八字方针。但是认识很不深刻，很不一致。这个“很不一致”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华国锋同志作为党的主席采取消极态度就是原因之一。至于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显著扭转，工作的进展和成就，“决议”里写了六条，同志们都很熟悉。我就不再作什么补充和介绍了。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这部分的二十七、二十八节，比提交全会讨论的稿子增加了两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在讲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加了这样两句话：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提意见的同志希望列举一下现在的或者去世了的领导同志的名单，后来考虑到名单列起来很长，而且也很难摆平，所以就没列名单。于是就写了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理论界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问题。这个提法，大家很满意，也举出了很多的事实。说我们这个领导同志，那个领导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可是马上发生一个问题，如果把周总理的著作说成是毛泽

思想的组成部分，把刘少奇同志的著作也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所有重要领导人的著作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对这样一种说法，起草小组讨论来讨论去，认为不够确切。周恩来文选，是周恩来的著作，反映周恩来的思想。刘少奇文集，是刘少奇的著作，是刘少奇的思想，不能统统归到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去。所谓作出贡献，应当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的经验和意见，也包括他们著作里的某些思想，经过毛泽东的吸收，用他的语言加以概括，然后用他的著作的形式发表出来。毛泽东思想应该表现在毛主席的科学著作上。比如，《决议》中提到的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在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内容。可是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刘少奇同志，毛主席吸取了他这个意见，表达成为现在的语言。又如，井冈山斗争中的“十六字诀”，主席一直没有说过“十六字诀”是他提出的，可是他肯定，这是我们红军游击战争的一个初步起始，是正确的战术思想。这个思想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有的同志讲是朱老总，也有的同志说可能是朱总理一个人提出的，象这样的问题应该说吸收了大家的贡献，毛主席加以肯定，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对外政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周总理提出，得到尼赫鲁的支持，主席肯定了，并在自己的文章中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这就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了。至于总理的很多外交报告，尽管是正确的，也不好说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有这么一个看法，究竟这个看法是否对，还可以继续讨论。这次全会刚一开始就说，补充修改意见很多，《决议》改的比原来好得多。按我个人的意见，这次全会修改得最好的是这一个部分，比原来提交全会的稿子好得多了。这集中表现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上，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来写，一个部分写他的理论贡献，一个部分写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或者说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经过全会讨论，这两个部分都比原来的稿子好得多了。内容更丰富了，结构更严密了，提法更准确了，有些估计更科学了。总的来说，这两部分不能够说概括了全部毛泽东思想，但是，确实把毛主席理论上的贡献，立场观点方法方面的贡献，把他最精辟的东西概括起来了，组织结构比较严谨，语言用得比较准确。下面，我分别地说明一下。

理论上的贡献，在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以前的稿子中，写了四条：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讨论中间，赵紫阳同志感到不满足，他说，你说让我提出积极的意见和改法，我也很难提，但是我感觉到，现在只写四个方面的贡献，没有把毛主席理论方面的贡献写完备，起码没有包括毛主席关于革命斗争战略策略的理论，而这一方面毛主席是很高明的，有不少独到的东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确实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央和小平、耀邦同志都认为他这个意见提得好，于是责成起草小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内容，说除了这四条以外，还有战略战术，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还有外交工作等。这样就搞得很杂，也没有表达出毛主席对战略策略的突出贡献，所以一提交全会讨论，大家很不满意。又经过讨论修改，现在就成为六个内容了。专门有一个方面叫政策和策略，这是第四。第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最后是党的建设的理论。这样一来，就把主席理论上的贡献，不仅只是增加两条，重要的是把他在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突出的贡献，扼要地概括地表达了。对于其他几个原来已经提出的贡献，也作了修改和补充。比如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这一条，增加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

原则，这确实是我们军队与其他军队根本不同的一个最重要之点，还增加了三大民主和十大军事原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拿党来讲，原来只讲了毛主席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在这个后面还有一句话 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讨论中间，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对，主席确实注意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他一贯提倡的方针，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可是这一段没有充分把主席的建党思想比较完备地表达出来。有的同志提出应当讲三大作风。这样一提，就接着加了《论联合政府》里讲的三大作风，说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经过这么一改，确实使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就完备得多了，内容也充实得多了，反映了主席在理论上思想上的贡献。讨论中大家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提得很好，可对这三条之前的几句导语，很不满意。原来的写法大体是：毛主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其基本点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本来

起草小组的同志写这一段是想说明这三个基本点比那些理论更带有普通性，更是需要我们今后长期贯彻执行的。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以后不需要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这个历史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可是贯彻在新民主主义过程中的他那些实事求是的方法，群众路线的观点，独立自主的原则，今天要贯彻，今后还要贯彻。本来起草的人是有这个想法，可是词不达意。讨论的结果，很多同志讲，把毛主席的这些贡献看得比理论还重要是不妥当的，而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很不满意，要求重写。有的同志甚至提出，是不是照原来提交四千人讨论的那个稿子，写成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了三条基本原则，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后来，我们几个起草的同志只加了一两句话，说这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理论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不但今天，而且将来都要贯彻执行的。亦木同志在修改的时候，也不满意。现在就改成《决议》中写的那二百多字，我给大家念一下：“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一段话我认为写得很好，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重要内容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样，我们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仅要学《反对本本主义》等有关的哲学著作，还要学他的全部科学著作。拿这样一个观点来学习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就学得更有味道了。我们虽然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可是我们学一下毛主席怎么样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就学习到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凡是毛主席的科学著作，我们都有学习的必要，还应该从中找到它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下解释一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决议》贯彻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

需要物质生产的提高和丰富，而且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作为精神支柱，用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否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可以保证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友好合作的关系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样才能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之内，形成统一的行动，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正是引导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部，教育了广大的人民，过去这样做了，使得我们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后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全体干部，教育我们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所有的干部，也包括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今后仍然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科学理论，这是小平同志多年以来一直反复宣传的主张。下面列举一下小平同志从七七年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一些论述，并且建议能够把这些论述编一个材料，供给同志们

学习，这看来很有必要。因为“四人帮”的残余，国外的敌对分子用各种形式进行造谣，说我们党主要是小平同志，要搞“非毛化”，这完全是诽谤、诬蔑。我们要驳斥这些谬论，就很有必要把小平同志的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的论述编一个材料出来。我这里只是列举一下：

一九七七年，《人民日报》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以后，四月十日，小平同志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这个“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对于批判“两个凡是”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在同几个同志的谈话中，当着汪东兴、李鑫的面说，你们这“两个凡是”提得不对，马恩列斯没讲过“凡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他不去世，他也会反对你们的“两个凡是”。他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这个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小平同志专门讲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林彪、“四人帮”用片言只语来欺骗人、吓唬人，实际上也就是批判了“两个凡是”。

十一大闭幕词中，小平同志讲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际上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

在全国的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上，小平同志批评了过去两个错误的估计，恢复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这期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指导下起草的。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正确的观点，一定要坚持。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在全军政工会上，小平同志很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反对当收发室，反对照搬照抄。这个讲话对于真理标准讨论是个很有力的支持。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从朝鲜访问回来，在东北沈阳、长春多次阐明，怎样才是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批评“两个凡是”有损毛泽东思想，有损毛主席的形象。

一九七八年冬天，即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时候，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反对思想僵化，提倡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进一步阐述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八〇年春节讲话，说四项原则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开始，就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实现三个基本要求，其中包括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那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他先后讲过十六、七次话，最重要的是四次，一次是八〇月三月十九日，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一次是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一次是八一年六月十九日六中全会召集人碰头会上的讲话。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到我们要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地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要进行全面评价，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过毕竟是

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够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

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号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再一次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够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只能够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够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就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批评了两种错误的态度，提倡一种正确的态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扼要地讲了这个问题。讲到正确态度的时候，过去他几次讲话说到，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他虽然没做，但是第一个提出来了，这个提出来的东西又是正确的，我们就要把它做好；要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做了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的努力把它做好。他说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我们还是要做这么几件事。当然，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新的结论来代替旧的结论。这次的《决议》，从已经看到的反映来

看，大家很满意。中央的公报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决议》通过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个《决议》，可以而且应该说，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能够把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复杂的问题，作出这样的结论，使全党同志都能够一致赞成，使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也都满意，这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外国人对我们的《决议》也都作了肯定的评价，今天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去参加活动，他们的大使说看了我们的《决议》，花了三天时间，他很高兴，说你们把这样复杂的问题写得那么清楚，解决得那么好，有了这个《决议》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开始新的一页了，就可以同过去告别了。最近耀邦同志讲，应该说这个《决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最后这一部分就比较简单了，我只介绍一个情况，就是第35节的十条。在起草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反复，直到这次提交全会之前，还考虑这十条到底写好还是不写好。最后呢，中央还是决定，必须写。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修改。理由就是，四项原则很重要，是团结党和各族人民的政治基础，可是光靠这四条还不能达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致，认识一致，因为四项原则终究还

是原则，怎么坚持这四项原则，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项问题，还需要做出具体的规定。而这十条就是这样的规定。这十条总结了我们三十二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后方针任务的规定。有了这十条，怎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更加具体化了，我们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就更落实了。

最后，第36节这一段也很重要。我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我们在各方面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里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话没有写在文件里头。前面讲过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可是在旧的剥削制度、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粉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以后，人民已经当家做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能够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再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我们还要坚持革命，一直坚持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可是进行这个革命的方法和采取的形式，列宁说过，是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里也说过同样的意思。如果忽视这一点，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象“文化大革命”一样。

讲到这里，《决议》全文就讲完了。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